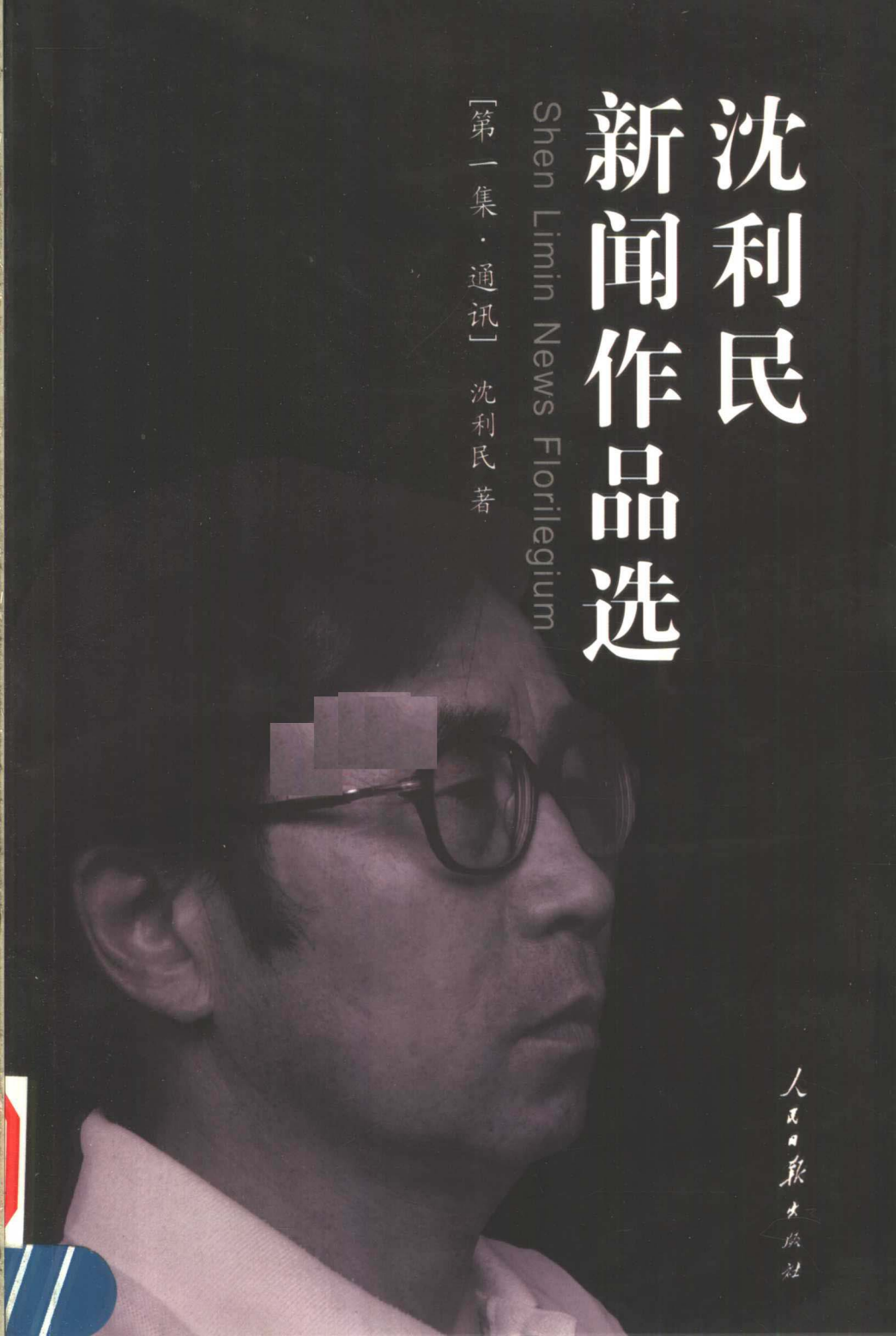


沈利民 新闻作品选

Shen Limin News Florilegium

「第一集·通讯」 沈利民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沈利民 新闻作品选

Shen Limin News Florilegium

「第一集·通讯」 沈利民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利民新闻作品选/沈利民 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5. 12

(浙江新闻丛书)

ISBN7-80208-106-8

I. 沈...

II. 沈...

III. 新闻通讯-作品集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28836号

书 名: 沈利民新闻作品选

作 者: 沈利民

责任编辑: 银 河

封面设计: 沈 溱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金台西路2号/邮编: 10073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浙江煤田地质局制图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6

字 数: 350千字

印 数: 2000

印 次: 2005年12月第1版 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208-106-8/G·098

定 价: 29.00元

大江的记忆

(代序)

我把两篇各自独立的散文并成一篇,前一篇写我父亲,后一篇写我母亲——作为本书的序言。也许这种做法不合常理,但我却认为这样很符合我编辑出版此书时的心境。因为,饮水思源,我身上的每一个文字细胞,都源自慈爱父母的血液。

【父亲】1970年夏天,我告别复旦大学,行将走上工作岗位,正在为没有一只像样的箱子装行李而发愁。一天,我来到上海局门后路父亲的住处,只见他在狭窄的灶间里摆开了临时木工场,刨花遍地,挥汗如雨,正为我赶制一只大板箱——足以装得下我所有衣物的坚固的箱子,还特地做了个扎实的搁置箱子的木架。虽然当时已经风行人造革箱子,我内心也想让父亲买一只,但父亲的盛情使我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他那特殊而实惠的毕业“礼物”。虽然他已多年没做正经木匠活了,但一旦上手,还是有板有眼,那大木箱做得榫头严密,天衣无缝。父亲还把箱子上了耐看的暗红色油漆。于是,我就带着这只大木箱和一只母亲为我新买的人造革大旅行袋,踏上了去杭州的列车。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手特别巧。他灵气十足,能文能武。不

光写得一手颜体好字，还会写一手漂亮的文章，诸如工作总结、情况简报、会议报告、新闻报道等等，几乎都能来两下子。他从小学过木工，木匠活绝对有专业水准。在“文革”中，他受到冲击，做过机械工人，车、钳、刨、铣无不精通。我家原本也非书香门第，曾祖父是木匠，祖父有些文墨，但也只是会计出身，俗称账房先生。听父亲说，他小时候练字，因为家里没有很多的纸墨，是受私塾老师启发，用一块大青砖作“纸”，一大碗清水当“墨”，笔蘸清水，“写”于青砖。如此，字迹在砖上停留数秒，悄然隐去。如此，青砖成了用之不竭的好“纸”。父亲大概主要练颜体，所以，我小时候过年，见他写“门对”（春联）时，那一笔颜体，真是力透纸背，神完气足。到目前为止，尽管我和小弟晓明的学历都比父亲高，但写字绝对达不到他的水准。

解放初，父亲才二十出头，又有初中文化，字又好，这在当时的乡下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便被吸收进土地改革工作队当文书。他的任务大概主要是摘抄上级文件、报纸上的土改信息，记录各家各户的土地面积、评比成份的资料等等。我小时候看过父亲的笔记本，一行行竖写的工整的钢笔小楷十分漂亮。

土改结束后，父亲去了上海，在祖父当账房先生的锯木厂里做工。那锯木厂是一位崇明老板开的，用的工人不少是崇明人。而高级职员中，我的印象，似乎就祖父是崇明人。锯木厂的厂名叫“中和”，大门开在一条弄堂的底部，粗大的木头都用板车运进厂里。几台立式锯板机就安装在用简易棚搭成的车间里。与锯板车间紧挨着的，是一个大仓库似的金工车间。老板的写字楼兼住宅就在车间一侧的一幢三层小洋房里。父亲那时年轻力壮，锯板时，他和工友们先把又长又粗的原木搬到锯板机的厚铁板做的锯台上，这时，环形锯条飞速旋转，父亲和工友们两人一边，抱住大木头，使劲地往锯口推去。这锯木厂主要为一些板箱厂提供板材，自己也加工板箱，主要是低档的肥皂箱等。父亲的宿舍就在车间后

面的阁楼上。每年暑假，我到父亲厂里玩，也就挤在那阁楼上睡觉。父亲那时的薪水大约40多元，偶尔也会跟工友们下饭馆，大都在附近的小饭馆里吃一二角钱一碗的“盖浇饭”——一种把荤素菜做成的“浇头”盖在米饭上的快餐，吃起来挺实惠。我最爱吃的还是“鸡毛菜线粉汤”——上海人把一种细嫩的小青菜称作鸡毛菜。父亲为了款待我，为我点一些上海风味的荤菜，可我吃不惯，不爱吃，因而常被父亲和他的工友们戏称为“洋盘”（外行、老土）。暑假里，父亲还带我去“大世界”玩，去看滑稽戏，甚至还让我坐过“强生”出租车，这在五十年代已是十分奢侈了。

读小学期间，父亲也曾鼓励我练毛笔字，他在上海替我买了一本王羲之的小楷字帖，可我练了一阵子，渐渐没了热情。现在想来，甚是后悔。

转眼间，我小学毕业了，考进了民本中学。学校离家有8里路，我一时住不进学校的寄宿生宿舍，就跟几位同学一起租了间学校西北角的民房。那里没有电灯，还点煤油灯。父亲每月给我12元的生活费，这在当时算是很高的水平了。一般每月的伙食费加上零用，八九元钱就够了。所以，每当我收到父亲寄来的汇票，同学们就很羡慕。后来到了三年“困难时期”，父亲给我的伙食费还是一分不少。这时，全国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原本几分钱一斤的大白菜卖到5角一斤，原本几角钱一斤的猪肉卖到5元钱一斤。我们学校的食堂里，也早没了鱼肉之类的荤菜，几乎天天是烧青菜（不是炒青菜，因为炒得用较多的食油），一大碗只卖一分钱（因为是废了学校操场种的菜）。这样，我每月的伙食费还是用不了几元钱。于是，省下的钱，我就在星期六去堡镇的“自由市场”买些大头菜之类背回家，让天天吃不饱的祖母、母亲和弟弟妹妹们掺和在稀饭里充饥。要知道，他们那时几乎天天吃野菜、米糠！而我，却基本上没饿着肚子，因为29斤的口粮定量一斤没减少，只可惜我这定量无法抠出一点来带回家。

就在这三年“困难时期”，在物质生活极度困乏的情况下，我的精神食粮却十分丰富。父亲一直不间断地给我邮寄《上海文学》、《萌芽》等杂志。他是在上海订的，再寄到我就读的崇明县民本中学。父亲平时与我通信时，也总是鼓励我多读文学书刊，多练笔。大概从初一开始，因为我的作文成绩好，所以一直担任语文课代表，直到高三。在初中阶段，我是图书馆的常客，一些外国名著，比如屠格涅夫的小说等等，尽管什么也看不懂，还是搬回家乱翻。借书多了，图书管理员也就格外开恩，破例让我进入书库找书。每天午休时间，人家在教室里埋头做数理化题目，我却一头扎进图书馆的报刊阅览室，浏览杂志。虽然我的数理化成绩由于下的工夫太少而一直不妙，甚至在高三上学期，物理还是补考了才及格的，但我的语文尤其是写作水平提高很快。高中阶段，作文经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印发给全班同学。在高二时，一次班级里排演参加全校文艺汇演的节目，是一个什么反映革命历史斗争的系列剧，需要用串联词把各部分衔接起来。班主任把撰写串联词的任务交给了我，我毫不费力地完成了，大家看了都很满意。到了高中毕业那年，学校又举行毕业文艺汇演，我班出一个“三句半”，又让我写脚本，我也轻松交稿，演出后效果颇佳。总之，父亲对我成材的影响是巨大的，是任何人也难以替代的。

1964年高考前，当我填写报考志愿表时，颇感忧虑，举棋不定。班主任朱玉昆老师见我面对志愿表若有所思，便大声说：“沈利民，要有雄心壮志，报复旦新闻系！”他的话使我为之一震：是啊，纵然考不上复旦，也还有其他志愿呢！但说心里话，我对进入复旦这样的名校不抱任何希望。试想，大上海有多少高材生在同时报考，只招收区区30余名学生的新闻系会有我们乡下孩子的份吗？谁知8月份一发榜，我竟被复旦大学新闻系录取了！我马上把这好消息写信告诉父亲。但父亲回信时，措辞似乎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兴奋。我想，他很可能感到了肩上新添的压力。是啊，我

们兄妹6个,是他人生路上一副再沉重不过的担子。如今,我考上了大学,又得增加多少开支!入学前,勤劳的母亲用她自己纺织的土布,一针一线为我缝制了好几身单衣。进了大学,祖父体谅父亲的困难,承担了我每月20元的生活费。那时学生食堂实行包伙制,每人每月交15.5元伙食费。所以,20元已绰绰有余了。照例,像我这样的家庭经济状况,完全可以申请人民助学金;但父亲在跟我谈助学金的事儿时,只淡淡地说:“如果可以(自己解决),就不要申请了。”所以,当政治指导员马光仁老师问我要不要申请助学金时,我就说不要了。

转眼间,天气冷了。一天晚上,父亲带着一件崭新的棉衣,到学校来看我。原来,他知道我没有一件像样的棉衣过冬,便早早替我到裁缝店做了一件。这是一件用蓝卡其布做的中山装式棉袄,不用再套罩衫,既像中山装,又是棉袄,穿起来十分舒服、轻便。我还是第一次穿这么好的棉袄。过去,母亲为了省钱,都是自己手工做全家人的棉袄的。

1966年,“文革”骤起。父亲是上海市手工业局所属飞跃工具厂的党支部书记,他们厂的“造反派”不甘落后,狂吼“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沈锡生”,父亲一如所有“走资派”经历的“必由之路”——先是被“火烧”继而被“揪出”最后被“砸烂”——从“检查交代”、“靠边站”、“接受批斗”而至“监督劳动”。而我整天在学校里埋头抄写大字报,几乎忘了回家——星期日到父亲在局门后路吉桂里22号的小屋团聚。以至后来,祖父因患肺癌住院了,我竟浑然不知,一味沉溺于大字报而不能自拔,而没有去看望更甬说照顾祖父。这时,父亲完全可以大声责骂我,但他非但没有生我的气,还忙里偷闲,大老远地把生活费送到我学校里。

“文革”闹剧收场,我到空军7350部队农场(空五军的“五七干校”)劳动了将近一年半之后,再分配到温州,进入《浙南大众》报社(温州地委机关报)工作。1975年春成家后,于1976年9月

13日生下了女儿沈淳。大约在她一周岁的时候,我和文兰都感到家中多么需要有人来照顾她。因为,当时文兰担任温州市纤维纺织厂副厂长,厂里正处于百废待兴的非常时期,十分忙碌;我们记者站则在温州地委统一领导下参加各项中心工作,也处于一个非常时期。于是,我和父母亲商量,可否把小淳放在崇明养一段时间。一次,我乘到杭州开会之机,回到崇明,陪父母亲到了温州。父亲还把一台凭票计划供应的上海产“蝴蝶”牌缝纫机挑到了温州,这台缝纫机一直用到现在。我们只有一间18平方米的住房,父母亲只能挤在一张狭窄的单人床上睡觉,而且又是木板床。对于睡惯了柔软的棕绷床的父母亲来说,每夜都睡不安宁。但他们白天仍要找事情做,甚至拿了扁担和铁桶,悄悄地替我们去老远的煤球店排队买蜂窝煤球。好不容易买到了,又艰难地抬到我们二楼的家里。他们身在温州,心里记挂着崇明,因为那里一大摊的事情还等着他们。于是,只住了不到半个月,他们就回去了。临走时,我们怕一周岁半的小淳知道把她送到崇明的真相会哭闹,便骗她说跟爷爷奶奶去“弯弯嬉”(到外边玩)。直到轮船开出瓯江,小淳才发现我们都不在了,哭着要妈妈。就这样,小淳在崇明一放就是半年,在这半年里,父母亲为照料她,不知吃了多少苦。为了让文兰和我放心,父亲几乎每隔十天半月就要给我们写一封长信,十分详尽地描述小淳在崇明的生活情况,她的成长过程,她的有趣故事。每当接到父亲那文笔生动风趣的来信,我和文兰总要细细地反复读好几遍,一边读一边笑,一边思念,一边流泪。我把父亲的来信都编上号,在信封上标明“小淳到崇明后”。小淳长大后,看了这一大摞信,深受感动。至今我还保存着这些信。因为,这是父母亲哺育我们两代人的历史记录。

6年后,我们又有了儿子沈淳。虽然沈淳是在幼儿园全托的,但文兰天天要上班,我出差时,每天早晨把她和阿淳送到她们厂车的车站,然后再上班。有一次,大约是初冬,我要到杭州去学习

半个月,不能请假。我走后,文兰一人在家肯定是吃不消的。温州的亲友们也无法帮我们。于是我们想到了父亲,就发了个电报,请他赶到温州来。因为母亲晕车,身体也不太好,所以只能劳驾父亲。父亲接到电报,马上动身赶到温州,当起孙子的“保姆”。因为父亲是个多面手,处事干练,我们每碰到困难就会想起他。1983年底,我分到了新房子,想粉刷装扮一番。于是和文兰又首先想到父亲,请他来帮忙,做“工程监理”。他接到电报,又是二话没说,风尘仆仆,舟车劳顿,还用扁担挑了一担农副产品给我们。他到温州的当天,我去码头接他,顺路到涨桥头农贸市场买了几只他爱吃的活梭子蟹。当天下午,父亲高兴地到蒲鞋市看我们的新房子。到了那里,我见卫生间还有不少砖屑,就把它们铲出去。父亲怕我累着,定要替换我铲,干得出汗。谁知,当天晚上,父亲突然吐血了,大口大口地吐。我们慌了,要马上送他去医院,而父亲却很镇定,说不要紧,是气管出血,等天亮再去。后来我们才知道,父亲到了上海就吐血了,可他还是坚持着上路,到了温州也不告诉我们。要是知道他吐了血,我就不买梭子蟹给他吃了,因为这蟹可能会对气管有刺激性;我也更不会让他走这么远的路,去看房子,铲砖屑了。后来,父亲在温州医学院附属一医住院治疗了20天。临回家时,我想送他到崇明,但他见我工作忙,执意不肯。于是,我只把他送到轮船上,让妹妹利娟到上海码头接他。

其实,父亲照顾的,又岂止我们这个小家庭。在崇明,还有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在上海,还有一个小儿子。不管谁家有事,总少不了父亲瘦削的身影,总可以听到他那时而轻微、时而厚重的咳嗽声……

【母亲】日落长江。母亲在沙滩上忙碌了整整一个下午了。那儿有一片片的碎砖瓦,经过江水经年累月不倦的洗礼,砖块和瓦片都被打磨成了圆角,有的干脆变成了椭圆形甚至圆形。它们大

都块儿不大,大的有巴掌大小,小的不过鸡蛋似的。母亲用一把斜齿铁耙把它们耙成一堆,然后捧进竹篾编的畚箕里。一担碎砖瓦大约有五六十斤,瘦小的母亲挑着它,走过平缓的沙滩,爬过高高的江堤,再沿着田间小路走几百米,才到家里。

母亲是在为家里的“重点工程”准备建筑材料。那些碎砖瓦是用来填地基的。我家兄弟五个,我在外地工作,二弟已经率先成家,母亲和父亲把自己住了近三十年的最好的朝东两间正房给了二儿子,剩下一间南书房和北边的天井都不宜住人,所以,再造一间房子成了当务之急。父亲那时在上海工作,乡下的家就靠母亲支撑。要再造老房那样的规模,是无能为力的。老房是祖父三十年代在上海事业鼎盛时期创下的家业,虽然不是什么大宅院,但一栋四间大瓦房,粗大的桁料,考究的椽子,明亮的大玻璃窗在当时一片低矮的茅草房世界里,已经是十分触目了。母亲决定紧贴南书房搭两间简易房,一间做卧室,一间做厨房。于是,填地基需要大量的碎砖瓦。为何不用石子?崇明岛一马平川,连一块石头也没有。

母亲出身在一个船员家庭。外祖父是一艘木商船上的老大(也可能是副手),外祖母是家庭妇女,家境很不宽裕。母亲降生时,上面已经有了两个哥哥。对于船员家庭来说,女孩显然是不受欢迎的。于是,母亲很快被送给人家领养。母亲的养母是一个地道的慈母,靠纺纱织土布度日。养父在油车桥镇的一家中药铺当掌柜。那时,这小镇还颇繁华,在崇明素有“金油车桥银堡镇,铜新开河铁竖河镇”之说。养母虽也是个小脚女人,思想却挺开明。那年头,除了大户人家,一般人家的女儿都不给读书,因为她们中不少人十二三岁就要去当童养媳,谁舍得供她们读书?又有几家供得起?而母亲的养母却不。她日纺夜织,手不停、脚不歇,一个铜板地赚钱。那时的老式布机,在布好经纱后,纬纱得用手梭,随着脚踩牵动经纱开合的踏板,一根一根地甩过去。织成一尺

布，得脚踩多少次踏板，手甩多少次梭子？恐怕只有织布人知道。于是，母亲在养母的“吱呀咔呀”的布机声中念完了初小。至于为什么没有读下去，母亲没有说起过。我只是后来听说，后来母亲的养父染上了鸦片，不光自己的薪水花光，还把养母攒的血汗钱也挥霍殆尽。为此，养母跟养父出现了感情危机，很可能由此殃及母亲的学业。

母亲的初小文化程度，对我后来读书大有帮助。在我读小学一二年级乃至三四年级的时候，每当我做作业时，只要她没有农活，就会拿了一只鞋底，坐在我的身旁，一边纳鞋底，一边看我做作业。看到我有的字写得好，就称赞我一声；看到我有的字写错了，写歪了，就停下针线，手把手教我。她的字虽然写得不老练，但结构精确，笔画分明，一丝不苟，没有错别字。我尤其怀念那春雨潇潇的星期天。其时，母亲陪伴在我身旁，丝丝欣慰的目光倾注在我的书本上。记得那时我家有一本袖珍本的线装唐诗图文读本，已经缺了封面，因为诗歌内容都是由书法家所写，加上每首诗歌配一幅颇有意境的图画，十分好看，我爱不释手。作业做完了，就把它拿出来读。这时，母亲也兴味盎然，每每与我一起诵读。她大概读的是私塾，先生读古诗的腔调有些特别，她也模仿那种调子，只是比较温和，不像私塾先生的摇头晃脑和夸张。我听了，只是觉得像唱歌似的，十分有趣。

母亲名叫施静贞，又名品郎；所以，年轻时有人叫她“品郎小姐”。她个子不高，但身材匀称，体格健壮，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她的肩上挑着全家的重担。她的亲人，除了生父、生母，还有养父、养母，两头都要照顾。我父亲在上海工作，也是她惦念和关照的重点。还有年迈的我们称之为“小太太”（可能是我曾祖父的弟弟的遗孀）的生活起居；丈夫在上海的婆婆，以及她视为生命的年幼的6个子女。岂止如此！还有我祖父在事业兴旺时期置下的田地——它们不在我家附近，东一块西一块，有两块离我家约有4

里路——都得她去播种，去耕耘，去收获。农忙季节，母亲就带上干粮，一早出门，直干到月上柳梢，才披一身露水，背一包工具回到家中。

挑粪、浇水、锄草、背柴、翻地、选种、插秧、撒药、割稻、打麦、晒场、推车、磨粉、碾米、腌菜、养猪、放羊、喂兔、赶鸭、挖沟……啊，几多农事，几多农活，几多风霜，几多岁月。母亲的背影总是湿漉漉的——那是劳碌的汗水浸润的背影。在我的记忆中，母亲除了用牛犁田的活没干过外，什么苦活累活都做过。风刀雨剑在她那原本红润丰腴的脸盘上刻下了一道道印痕。

母亲最辛苦的日子大概要数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当中了。那时，我在复旦大学校园里“闹革命”，忘了一切。父亲在南市区的一家小厂里挨“造反派”批斗——因为他是上海飞跃工具厂这么一家不到200号人的企业的党支部书记，成了厂里头号“走资派”。一段时间，父亲失去了人身自由，他必须随时听从“造反派”的使唤，该接受批斗就批斗，该写检查就检查；尽管体质虚弱，但老家崇明是不许回去的。于是，母亲走上了照顾父亲的漫漫长途。她与父亲虽只一江之隔，然而要见面又谈何容易。母亲手提肩背装满了给父亲增加营养的瓶瓶罐罐，诸如猪油炒米粉、白糖炒芝麻等等，先得步行8里路，到堡镇港乘“市轮渡”——那其实是一种“水上大公共汽车”，往往人满为患，上船迟了，上下两层甲板挤满了人和行李，连插脚的地方也难寻，有时就只能一路站到底，经过近2个小时的航行，到达吴淞码头。然后再步行约2里，到51路公共汽车站排队挤车去市区。51路并不直达父亲局门后路的家，所以母亲还得中途转车，一般是到了上海北火车站附近的虬江路换乘63路，到斜桥下车，然后再步行约2里，才到目的地。最要命的是，母亲有晕车的毛病，一上汽车就会头晕、恶心，严重时还会呕吐不止。要是有座位还有个依靠，要没座位，一旦呕吐，那就惨了。所以，每乘一次汽车，对于母亲都是一次折磨。但母亲义无

反顾,她坚持每星期去一趟上海,照顾父亲,替他洗衣服,整理房间,为他做些好菜;更重要的,是抚慰他正在滴血的心灵。父亲能够顺利地度过那段非常岁月,精神和肉体都没有跨,跟母亲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祖父病重的日子里,母亲到了上海,就有了双重任务,既要照顾重病的祖父,又要抚慰落难的父亲。后来,她下决心把家里的活安排好,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里,祖父在上海胸科医院的病床上与世长辞。母亲在祖父的遗体火化后,与父亲一起,把骨灰盒送回崇明家中。当“市轮渡”靠上堡镇码头时,夜幕已经降临。母亲和父亲顶着呼啸的朔风,背着沉重的行李,高一脚低一脚地西行。当走到码头西边的河堤上时,冻得坚如顽石的土块把母亲绊了一跤,母亲的身子扑向地面,怀抱的祖父的骨灰盒不敢松手;于是,她的脸部狠狠地砸到了冻土上,顿时血流满面,两只门牙顷刻撞断。

母亲在一天天消瘦。为全家操劳似乎永远是她的天职。记得在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为填充我们的肚子,母亲在家务劳作之余,还要到处寻找能吃的野菜和青草。大概是1969年,大学里动员献血的时候,我也参加了,一次就献了300CC。母亲得知后,心痛得很,马上炒了满满两大瓶芝麻白糖和猪油面粉,又是一路颠簸,送到我学校里,让我补血养身。

母亲的养父因为有些文化,又会些中医外科,所以,生产大队让他担任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类似“办公室主任兼医务室主任”的工作。但随着年岁的增长,他的肺部等器官都出了问题,渐渐地生活也难以自理了。母亲是他唯一的子女,他的离异的妻子即母亲慈爱的养母虽然也还惦记着他,但严重的气管炎等疾病,加上路途遥远,也使她无能为力。于是,照顾养父的重担,又落在了母亲的肩上。母亲天天一大早起身,赶到4里路之外的养父家里,替他烧饭打水,做菜洗碗,洗衣晒被。后来,养父大小便失禁,也是母亲一

手服侍。而几乎与此同时,母亲的养母也时不时地卧病不起。她家离我家近40里,晕车的母亲,不愿乘汽车,而是坐家乡人所称的“二等车”即载客自行车去养母家。但“二等车”在乡下也难觅,也得先步行8里路,到了堡镇才能坐上。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每十天半月就要去一次。遇到刮风下雨,“二等车”停运了,就只得坐汽车。那车站靠近北堡镇的“红领巾桥”南侧,离南堡镇码头还有4里路,母亲的辛苦自不必说。

是的,让母亲牵肠挂肚的人太多了。她的身体越来越干瘦、虚弱。但他依然惦记着别人。自留地上收获的黄豆、赤豆、芝麻等,宁可自己少吃甚至不吃,也总忘不了大包小包邮寄给千里之外的我们。每当有病痛,她也总是瞒着我们,生怕我们担心甚至远道回家看望。

似乎是雨果说的,世界上最大的,不是大海、天空,而是胸怀。是的,我要说,是母亲的胸怀……

沈利民

2000年1月3日

写于温州市鹿城区广场路184号

目 录

大江的记忆(代序)	1
-----------------	---

第一辑 东海回声

阿外楼轶事	3
企业活力之所在	7
传统行业的新崛起	13
温州市场纵横谈	20
温州的第二职业	23
温州人的物价观	31
“黑色世界”掠影	37
温州个体户近况杂录	47
“静悄悄”的背后	56
“生下孩子再取名”	58
积聚文明的光点	61
播响国企改革的大鼓	69
奔涌的铁流	75
“快鹿”雄风	82
鞋城之光	87

正泰之路	90
厂长和画家	99
“西山”何时起东山?	102
逐鹿东海	105

第二辑 城市变奏

解放思想话温州	115
温州:第二次创业	120
飞云古渡吟	124
金温铁路的催生者	127
瓯江史诗	131
瓯海壮歌	139
在催化与聚合中壮大	146
从南关到霞关	151
可喜的转变	156
集聚与辐射	160
经济要升位 党风要升格	164
“送管上门”	169
问楼哪得高如许	172
温州告别的不仅是菲亚特	176
鹿城“变脸”	182
温州古民居吸引世界目光	185
东瓯山水竞风流	191

第三辑 生命交响

李子元传奇	201
-------------	-----